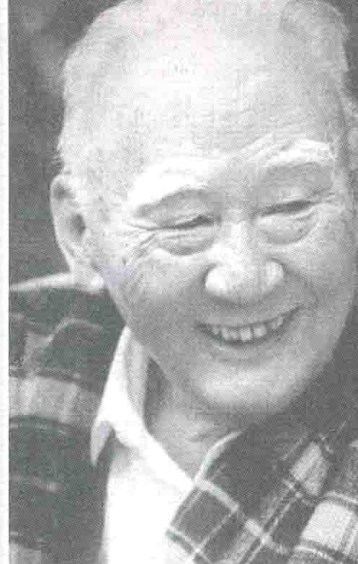


1 编辑卷

叶至善集

叶至善 著
叶小沫 叶永和 编

开明出版社



1 编辑卷

叶至善集

叶至善 著 叶小沫 叶永和 编

开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叶至善集. 编辑卷/ 叶至善著; 叶小沫, 叶永和编. —北京: 开明出版社, 2014. 7
ISBN 978-7-5131-1666-4

I. ①叶… II. ①叶…②叶…③叶… III. ①叶至善 (1918~2006) —选集②编辑
工作—文集 IV. ①C52 ②G23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93361 号

叶至善集

叶至善 著 叶小沫 叶永和 编

出 版 人: 陈滨滨

责任编辑: 支 颖

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西三环北路 25 号

邮 编: 100089

电 话: 88817647 (总编室) 88817489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kaimingpress.com

高教社 (天津) 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38

字 数: 581 千

定 价: 10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



叶至善（1918—2006）

《叶至善集》序

商金林

小沫、永和姐弟俩经过四五年的搜集和整理，将至善先生的文集汇编成编辑、传记、科普、散文、创作和书信六卷，即将付梓。至善先生文集的出版，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。小沫要我写篇序，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，许多往事纷至沓来。

—

001

一九七六年冬天，第一次到叶府拜访至善先生，见面时连怎么称呼他都想不好。虽说“文革”已经结束，但“革命”的风气犹存，最流行的是叫“同志”，客气一点的称“职务”。在我国现代作家中，子承父业，做得最杰出的，当首推至善先生，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、教育家和编辑出版家，叫“同志”就显得不够尊敬。叫职务吧，也不好叫。至善先生主持过《开明少年》的编辑工作，主编过《中学生》杂志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，还担任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理事长，怎么叫才好呢，再说当时他还在“赋闲”，叫“职务”就有点“哪壶不开提哪壶”了，急急巴巴的叫了一声“叶老师”，这一叫就是三十年，直到他二〇〇六年离世时都没有改过口。

这“老师”真没白叫。从那以后，至善先生真的成了我的老师。怎样做人，怎样读书，怎样治学，怎样认识真理、明辨是非，处处给我示范。这三四十年以来，我的点滴进步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循循善诱，言传身教。至善先生也在文章中提起过我，在《父亲长长的一生中》是这样说的：

七十年代后期，金林兄就常来看我。他在各个图书馆尘封的旧报刊堆里找材料，发现了些什么，就像见着矿脉露了头，兴冲冲地跑来了，像是炫耀，又像是报喜。有时候还真个解开了在我心中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疑团。如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的青云路惨案，我那时没满八岁，分明记得有这么回事，却连到底发生在哪一年都说不清楚。是金林兄找来了我父亲在当晚写的报道——《“同胞”的枪弹》；是父亲听我念了他自己写的报道，才陆续回忆起了当时的若干细节。要不，在前头，我不可能把这件惨案交代得这样有头有尾的。这是后话。由于金林兄发掘不止，我和至诚知道，父亲有许多散文没编进集子，因而后来的选家和评论工作者选来选去，评来评去，总是《藕与莼菜》《没有秋虫的地方》那些篇目；后来出了本《小记十篇》，又尽在这十篇中打主意。兄弟俩都认为这种现象不太好，应该改变，跟父亲说了。他老人家说情形确乎如此。我和至诚又说，商金林找来了这许多没收进过集子的短文，内容各式各样，编两本集子也绰绰有餘，我们很想试一试。

他在这里说的编“两本集子”，就是后来出版的《叶圣陶散文甲集》和《叶圣陶散文乙集》。“七十年代后期”，百废待兴，图书馆满腔热诚地欢迎八方来客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。那时国家图书馆还没有建，老北京图书馆在北海，报库在西皇城根，杂志则藏在雍和宫东侧的柏林寺，相距叶府都不算远，我常到这几处查阅书刊，有了收获就“兴冲冲”就近到叶府“炫耀”和“报喜”。常常是至善先生先看，看得感兴趣了就叫圣陶先生出来念给他听，我也乘机请教我想知道的问题，获益颇多。

进入八十年代，我国的学术研究重新步入正轨并日益繁荣。由于研究资料匮乏，一时间走访名家成了寻找资料的一条路径，人与人之间日常的往来也骤然急增。为了减少干扰，许多人家大门上都装了“猫眼”，听到敲门声，稍稍地从里往外瞧，看清了是何方来客再决定是否开门相迎。叶府是一座四合院。白天，院子前面的二道大门都是虚掩着的。假如至善先生在家，推开第二道大门，跨过门槛，透过明亮的玻璃窗，便

能看到他就坐在北屋书房里正在看稿或写稿。那年月，叶府真是门庭若市。有时我刚坐下，新一拨客人又来了。遇到这种情况，至善先生就把我让到他的书房，让夫人夏满子陪我聊聊天，他接待来访的客人，要是圣陶先生得空也出来一同接待。来访的客人大多是有备而来，请教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曾经不止一次的听到至善先生对来访者说“是否可结束了”，“哎呀，怎么把我们当字典用啊！”希望访问的时间不要拉得太长。圣陶先生毕竟年事已高，坐得久了，话说多了就吃力。他又讲礼，不愿意让外人感到为难，所以类似“挡驾”的话只好由至善先生来说。有一位老朋友当着我的面劝至善先生说：你那么忙，事前没有约好的客人有的可以不见的呀，你躲到别的房间，说不在家不行吗？至善先生则平静地说：“这人做了一辈子编辑，最不愿意的，是让人失望。人家找到你，说明人家信赖你，怎能忍心拒绝呢？不见不合适，宁可把客人骂走，也不能躲着不见。”这番话说出了他待人的真诚。其实，至善先生是很乐意与来访者交流看法、探讨问题的，待人以诚，识人唯长，这是他一贯的风格。只是有些来访者这也问那也问，就连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也问个没完，总希望不虚此行，访问的时间越拉越长，这让至善先生感到有点陪不起。

003

从表面上看，“叶氏父子”是有差异的。圣陶先生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，当小学教师时受到排挤，一度靠卖文补贴家用，后来成了名家，文章享誉海内外，“圣陶”这个名字也成了“微温”、“微甜”的象征，被誉为几代人的师表。与他老人家相比，至善先生则出身名门，岳父夏丏尊先生也是大名鼎鼎的作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，成长在这种家庭中，免不了会沾点“大少爷脾气”，初次见面或者交往很浅的人或许也会有这种感觉，但见多了就会感受到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，至善先生传承着父辈为人处世的精神，按父亲希望的那样做人编书作文。生活中的至善先生，待人周到细致极了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王泗原先生生前是叶府的“常客”，这是一位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学者，患有严重的关节炎，手脚不那么灵便，生活极其简单。逢到过年，至善先生会让家里人做几样菜，他亲自送给王先生。朱光潜先生善饮，“大小姐”出身的朱太太不会下厨，至善先生来北大看朱先生时，也是带着烧好的几个菜过来的，陪着朱先生边喝酒边聊天。九十年代初，我的家人移居海外。年三十一大早，

二

至善先生越老越忙，越老荣誉越多，职务越多。一九九一年起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，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二届副理事长、第三届理事长、第四届名誉理事长；国家教委中小学教科书审定委员会委员；韬奋图书奖荣誉奖和国家级图书奖终身评委；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顾问；中国编辑学会顾问；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、名誉副主席；全国政协第二到第五届委员，第六、七届常委、副秘书长，第八、九届常委，是全国政协委员届数最多的委员之一。但他毕生以“我是编辑”为荣，不止一次的说过：“我这辈子，其他都是虚的，编辑是实的。”从一九四五年八月进入开明书店，跟圣陶先生一起，编辑《开明少年》杂志算起，当了半个多世纪的编辑还“老觉得没做够”，他不同意当编辑是“为人作嫁”这种似乎总觉得吃了亏的说法，坦言自己之所以喜欢编辑工作，仿佛永远怀有巨大的“编辑瘾”的原因，“一是可以满足我的创作欲，跟当工程师当艺术家没有什么两样；二是可以满足我的求知欲，随时能学到杂七杂八的诸多知识。”他的这些想法与圣陶先生的想法是一致的。圣陶先生早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写的《“先驱者”》一文中说：

005

（编辑）的事业真是重要且伟大！他们给人以精神的粮食，授人以心的锁匙，他们不是超乎庸众以上的群么？——至少也应是先驱者。

编辑面对的不仅仅是“幼稚”的“未成熟”学童，也面向“攻究科学的文学的乃至一切学问”的专家学者，面向“经商的做工的乃至营一切事业的”国民，这就要求“我们的编辑者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”，“时代是刻刻趋新的，学问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扩大的。要永久站在时代的前列，要探测深广的学海”，编纂出精美的书刊，奉献纯正的“精神食粮”，成为“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”。正是基于编辑是“先驱者”的这个“定位”，圣陶先生强调“编辑工作就是教育工作”，编辑和教师一样都是思想文化园地辛勤劳作的园丁，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也正是基于这个理念，至善先生才说编辑“跟当工程师当艺

术家没有什么两样”，编辑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，编辑工作讲究学术和艺术，这中间大有学问。每一本书，从提出选题到印制成书，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发挥编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达到一种只有经过编辑加工筛选才能形成的风格和水准。八十岁那年，至善先生特地填了一首《蝶恋花》，不仅把它印在《我是编辑》的封面上，还亲自用笔工工整整写出来，印在衬页上，最后写上“至善求正”四个字。这首词的全文是：

乐在其中无处躲。订史删诗，元是圣人做。神见添毫添足
匠，点睛龙起点腮破。信手丹青宁复可？难得心安，怎解眉间
锁。句酌字斟还未妥，案头积稿又成垛。

“乐在其中无处躲”，编辑工作对于他来说是这样的欣喜和满足。谈编辑工作的诗作还有几首，有一首《贺新凉》的全文是：

矻矻何为者？事雕虫、咬文嚼字，灯前窗下。烟蒂盈盘茶
重沏，忽忽秋冬春夏。且不悔为人作嫁。彩笔苦无回春力，敢
丹青信手胡描画。千古事，费评价。杞人自笑忧天塌。更何须、
占风卜雨，担惊受怕。红紫万千迷人眼，细辨真真葩假。再学
习延安讲话。伏枥识途都无据，意拳拳尽力添砖瓦。翻旧调，
寄骚雅。

“且不悔为人作嫁”，这一句是冲着当编辑是“为人作嫁”这个说法说的，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他对编辑工作的无限热爱。至善先生够得上“老开明”。一九五三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，成立隶属于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，至善先生成了中青社“元老”。一九五六年，决定成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仍由中青党组领导，“一个大院，二块牌子”。虽说至善先生受命担任中少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，但对中青社的工作一如既往的关心。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，中少社与中青社互为呼应，共创辉煌。中青社推出《红日》《红岩》《红旗谱》《创业史》即“三红一创”红色经典读物的时候，中少社也出了《小兵张嘎》《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》《小武工队员》《两个小八路》，以及学雷锋、学王杰等一大批少

儿红色经典读物。作为中少社的领导，至善先生只要有可能，每一本新出版的书他都要亲自过目修改。童话作家孙幼军的《小布头奇遇记》，就是他一字一句斟酌着，在不改变作者文风的情况下进行修改的，又亲自找到著名儿童漫画家沈培一起策划开本和装帧设计，配置了一百七十八幅插图之后，隆重推出，使之成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。至善先生的上述业绩，我当然只能“听说”，可《蝶恋花》和《贺新凉》这两首词中写到的“句酌字斟还未妥，案头积稿又成垛”，以及“灯前窗下”“咬文嚼字”的情景，却都是亲眼所见。看稿改稿，浑忘昏昼。虽说“案头积稿又成垛”，但“句酌字斟”，精益求精，总要觉得“妥帖”了这才心安，所以凡是经他看过的稿子总是“一片红”。至善先生跟我说过：改别人的稿子，得顺着作者的思路和口气来修改，改完之后还得是原来的风格，否则就成了替作者“写稿”了。凡是他“改”过的，他都会说出“改”的理由来，让作者得到切实的指导。至于不需要修改的稿件，他也会告诉作者不用修改的原因，绝不含糊和敷衍。

二〇〇四年秋，我撰著的《叶圣陶年谱长编》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，校样出来后，我请至善先生帮忙看看我写的《自序》。他当天就让儿媳蒋燕燕来电话说“写得挺好的，不用修改”。第二天，又让小沫来电话说“写得真的挺好”。他大概是觉得这“写得挺好的”一句话说得有点简单，所以又让小沫复述一遍。作为一个编辑，他就是这样周密，处处替别人着想。

007

三

至善先生在进开明书店之前当过教师，可他总说他不会讲课，更不会做报告，还说场面越大他越不会讲话，只喜欢聊天。这大概与他淡泊名利，遇事低调处理，不喜出头露面的个性有关。我曾听过几回他在集会上的讲话，都很简洁，没有客套，更不会摆架子。“聊天”听得最多。他思维敏捷，逻辑性强，记忆力好得惊人，又博学多能，文化、教育、出版、历史、诗词、音乐、文坛掌故、前辈和朋友的往事，知道得可真多，天文、地理、科学、文学、人情、社会，说起来既生动又风趣。与他相对，真有“春风拂面而来”之感，一次聆教，终身受益。

至于他的文章，就更经得起慢嚼细品了。“科普卷”第一篇是写于一

九四五年的《纪念“九一八”说起大豆》，全文共分为九节。第一节谈“日本为什么强占咱们东北”，写到《流亡之歌》和《长城谣》，点出“日本占领东北”，就在夺取“森林，矿产，大豆，高粱”这些财富。第二节用“数字”告诉读者东北的“森林”、“煤矿”、“铁矿”、“黄金”及“农产品”在“我国”和在“世界”上所占的比重。第三、四两节说到有关“豆腐”的谚语，说到金圣叹“临到砍头的时候还对豆腐干恋恋不舍”的传说；说到豆浆、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皮制作的方法，以及清末民初我国留学法国的学生在巴黎开的一家豆腐公司的往事。第五节写到曹植咏酱油的《七步诗》：“煮豆持作羹，漉豉以为汁”（这“漉豉”就是酱油），又说到古书上有关“孔夫子喜欢吃酱”的记载，进而写到大豆“地地道道是我国的‘国粹’”。第六节写到“豆油”“豆饼”的制作、用途及“出口”情况。第七节写“豆芽中的维生素C”。第八节写日本侵略者用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为他们侵略中国辩护。最后一节从大豆根上的小瘤说到“生物共生”，进而声讨“为了自己过得更好”而“欺凌别的民族，掠夺别的民族”的“德、意、日”三个国际强盗。

008

把“大豆”写得如此丰富，联想得如此开阔，又如数家珍，得心应手，知识性、思想性、文学性自然地而又恰到好处地糅合在一起，给作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。就内容涉及的话题而言，真是“包罗万有”，“纵横古今”；就写作的手法和特色而言，则是“小中见大”，“夹叙夹议”，既可以当作有厚重的思想力度的科普作品来欣赏，也可以作为一篇“窄而深”极富文学性的学术论文来阅读，像杂文，又像是“时事综述”，是一篇相当及时而又富有深远意义的爱国主义教材。

“科普卷”第二篇《黄金的悲剧》，从国民党政府实行“币制改革”，用金圆券代替原来的法币，把人民积蓄的黄金、银元全都搜括一空的勾当写起，写到美国旧金山发现黄金和随即兴起的淘金热，中间带进来滑稽明星卓别林的喜剧片《淘金记》和著名小说家杰克·伦敦的小说《一千打》；进而写到他本人在湖北沙市亲眼看到的淘金人沙里淘金的苦难生涯；接着写到真金不怕火炼的故事以及黄金的化学性质；写到公子哥儿出洋“渡金”在国外鬼混花钱买博士文凭光宗耀祖的丑事；写到金子的实用价值，以及在“充满了迷信、愚昧和欺诈的炼金术中，竟长出了现代科学中最发达的一个部门——化学”，写到化学的各种元素，写到“中

子”和“质子”，写到原子核的“裂变”和“聚变”，写到“比黄金还宝贵不知多少倍的原子能”，由点到面，由浅入深，娓娓道来，既顺理成章，又别开生面，换一个话题就是一道风景。记得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：他一生写得最用心的是《文艺心理学》和《诗论》，他在《谈美》一书的《开场话》中说：“在写《文艺心理学》时，我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”。《诗论》花费的精力比《文艺心理学》要多得多，往往要看几本书才写一二行。至善先生写科普作品，大概也是像朱先生写《文艺心理学》和《诗论》那样，往往要看几本书才写一二行，“要先看几十部书才敢下笔写一章”。这都说明他书读得多，读得杂，读得透彻，因而他的作品才能如此开阔，如此精彩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阅读决定写作”。

每次见面，至善先生总会问问我“最近有什么新闻”，告诉我他新近读过书，要是我也看了的，他会问“好不好”，“好在哪儿”，引导我和他一起思考。要是还没有读过，他会告诉我他的阅读心得，希望我也找来读一读。哪些书只需浏览，哪些书需要细读，至善先生也要求我多加区分。他强调对名家名著要反复阅读，一再叮嘱我要多看鲁迅、朱自清、沈从文和朱光潜的书，多看《论语》和《红楼梦》，还说到看书也得讲进度，说“看得快”也是一种基本功。至善先生最后一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，只要头脑还清醒，他就想看书。记得他最后看的是《红楼梦》，疲乏得连拿一本书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就让家里人把《红楼梦》拆开来，“一回”、“一回”的拿给他看。真的是活到老，学到老。

就艺术手法而言，至善先生最娴熟的当推散文，写得既潇洒又随意，情真意切。就艺术成就而言，至善先生排在第一位的是科普作品。他秉承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的理念，十分看重“科学”。他说“科学”主要指的是“思想的科学化”，但“科学技术”和“科学知识”也相当重要，用“科普作品”就是向青少年传播科学思想，激发想象力，引导他们从小就热爱科学、确立向科学攀登的远大志向——这就是至善先生的“科普情结”。为此，他不断探索，在形式上大胆创新，变着法儿要让科普作品写得让读者喜欢看。是他最先把相声、小说、戏剧等形式移植到科普创作中来，写出了科学相声、科学小说、科学戏剧，早在一九五七年创作的科学相声《一对好伴侣》，就对如何用相声这一形式介绍科普知识作出了可贵的尝试。这一年发表的《失踪的哥哥》，以冷冻人为科幻构思，讲述

了超低温条件下人体冷冻死而复生的故事，妙趣横生，想象奇特，是那个时期科幻小说的经典之作。八十年代初，至善先生又率先用短篇形式介绍科学家，创作了短篇集《梦魇》，写达尔文、拉马克、布鲁诺、巴斯德、居里夫人怎样闯过一生中最严峻的时刻，以此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。至善先生认为科学家跟其他人物一样，“他们在一生中都碰到过一些很关键的问题，逼迫他们不得不作出抉择。抓住这样的时刻，探索他们的内心活动”，就能把他们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更丰满一些，让“读者看了或许能留下一点儿粗略的印象”，而这个创作动意则萌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个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岁月。

从酝酿写“科学家小说”之日起，至善先生就开始收集资料，除了文字资料，图片资料也认真搜集。有不清楚的细节，他就向国内专家请教，还取得国外友人的帮助，尽可能做到“求真”和“有据”。比如他阅读文字资料时，原以为布鲁诺被烧死的地方繁花广场是大教堂前的一个大广场，后来请教意大利专家，才知道是个不起眼的小集市。常言道“十年磨一剑”，至善先生写“科学家小说”，前后磨了三十年。他在《梦魇》的附记《多余的话》中说：“用短篇小说的形式介绍科学家，在我是一种尝试，我好像闯进了一个陌生的领域，感受很新鲜，到处都有乐趣”，虽说因为种种原因，耽搁了不少时日，但“时间的流逝，我倒不十分惋惜。探索人物内心世界需要阅历，而阅历的增长总得付出时间作为代价，何况中间还有个史无前例的十年呐。如果没有这段阅历，我对那几位科学家的理解一定还要浅薄得多”。事实也正是这样，阅历越深，对所写人物的理解也越深，刻画出来的人物也就越深刻，作品的内涵也越丰富。至善先生写“科学家小说”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可以叫做孜孜以求，痴心不改，厚积薄发。

四

凡是看过《叶圣陶叶至善于校家书（一九六九—一九七二）》的，无不为至善先生抱着“完全”、“彻底”的精神，忘我地、创造性地当好“牛倌”的事迹所感动。一九六九年四月到河南潢川团中央“五七干校”，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结束“干校”生活，回到北京。至善先生在“干校”三年又八个月，其间与父亲一来一往，写了很多信，仅收入《叶圣陶叶

至善干校家书（一九六九—一九七二）》中的就多达五百封，近七十万字。虽说是“家书”，但“干校生活”是主体，说得最多的是“养牛”。至善先生到干校后就被分配在养牛组，人少牛多，忙得团团转，喂草、喂料、喂水，把屎、把尿，就像对待托儿所的小孩那样，无微不至。爱“牛”，爱得难以形容。

劳动强度是超负荷，生活条件艰苦得不能再艰苦了，但年过五十的至善先生就像圣陶先生童话《快乐的人》中的那位“最快乐的人”似的，“觉得事事快乐，时时快乐”，真的是“吃嘛嘛香”，“住哪儿哪好”，一有空就钻研“养牛经”，摸索如何“改革牛鼻叉”，“牛鼻绳”该怎么搓打，到哪里去挖苦参给牛滋补，怎样给雄性水牛动手术“阉”（做绝育），怎样照料老母牛这个“产妇”，怎样给牛打预防破伤风的疫苗，这一连串的“老大难”，都在实践中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从“必然王国”逐步过渡到“自由王国”。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，组织上安排他的夫人满子参加家属代表小组，到潢川“五七干校”参观慰问，家属代表们受到校部敲锣打鼓的欢迎，这在当年是最大的奖赏，最大的光荣。

有朋友告诉我说：至善先生去“干校”之前，在夫人满子的精心照顾下，可以说有点儿“养尊处优”，要是换一个人，别说酷暑住四面漏雨，严寒住八面透风的牛棚，光是“饮食”这一关就很难熬，没料到他这么“能上能下”，到了“干校”就“脱胎换骨”，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把至善先生的“蜕变”归结为他在“干校”被动地受到磨炼，是“被改造”的结果。这位朋友大概没有注意到至善先生是一位很讲“认真”的人，弘一法师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，而弘一法师正是一位事事“认真”的典范。

关于弘一法师的为人，夏丏尊先生在《〈弘一大师永怀录〉序》中说：

综师一生，为翩翩之佳公子，为激昂之志士，为多才之艺人，为严肃之教育者。为戒律精严之头陀，而卒以倾心西极，吉祥善逝。其行迹如真如幻，不可捉摸，殆所谓游戏人间，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。现种种身，以种种方便而作佛事，生平不畜徒众，而摄受之范围甚广。

夏丏尊先生对弘一法师的“认真”作了精彩的诠释。至善很认同夏丏尊先生的评赞，十分欣赏弘一法师的“认真”：当“翩翩公子”时是“认真”的翩翩公子，当“志士”时是“认真”的“志士”，当“艺人”时是“认真”的“艺人”，当“教师”时是“认真”的“教师”，“出家”后是“认真”的“和尚”。一九二九年，夏丏尊先生集资为弘一法师在白马湖建筑“晚晴山房”，弘一法师在“晚晴山房”驻锡期间，还是小姑娘的满子负责给他送饭，对于弘一法师无论吃什么都细细品味，绝不“乱吞胡咽”的神情记得特别清楚。至善先生从她口中对弘一法师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告诉我说弘一法师最能“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”，认为“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，一切都好，小旅馆好，统舱好，挂褡好，破席子好，破旧的手巾好，白菜好，萝卜好，咸苦的蔬菜好，跑路好，什么都有味，什么都了不得”，说弘一法师对生活有“真”的了解，因而也能得到“真”的享受，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“认真”。至善先生在“干校”的“脱胎换骨”，同样的也得益于他的一贯的“认真”。虽说身居高位，享受高薪，生活优裕，但到了“干校”就认认真真地放下身段，过起“干校生活”，披星戴月，战天斗地，晴天一身汗，雨天一身泥。放牧、锄草、配制饲料，就像看书写文章那样一丝不苟；把屎、把尿、谨防牛不被牛虻叮咬，就像当编辑时帮助作者看稿改稿、杜绝出错似的那么用心，自觉磨砺，创造性地把“牛倌”的工作做到最好，做到极限。“认真”才是至善先生“脱胎换骨”的“源头”。

至善先生说过他“写作有两条守则：一条是要写自己的话，一条是要自己用心改。”至善先生晚年多次谈起周有光先生，赞赏他与时俱进，很早就用电脑写作，他自己没能趁早学电脑，写稿子只能伏在书桌上爬格子。用电脑写作，最大的好处是便于修改。至善先生“爬格子”，“爬”得特别辛苦。虽说是“大家”，可写东西似乎总不那么“自信”，即便写一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函，也总是先打底稿，反复看过后觉得满意了这才恭正地抄写一遍。他给《叶圣陶集》图片写的“文字说明”，短的只有十几个字或二三十个字，长的也不过几十个字，但他反复打磨，定稿前还特地让小沫念给我听，看看是否新颖，是否顺畅。《叶圣陶集》有二种版本，同一张图片，可在不同版本中的“文字说明”是不尽相同的，这

都是至善先生认真打磨的结果。至于长的文章，写作过程中的推敲和斟酌更多，改一次抄一回，一篇文章抄抄改改好几遍。至诚先生去世后，他写《至诚终于先去了》怀念至诚，文章刚写了一半，恰好我去看他，他就念给我听，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。满子告诉我说“一边写也是一边哭”。等我下次再去的时候，文章已经写完了，他把结尾念给我听，叫我看这结尾是否收得住，结尾是这样写的：

兆言陪我们到宾馆。我跟他说：“你请谁帮我们买一只花篮，一定要用鲜花。你爷爷最讨厌纸花。”第二天，就是二十七日早晨，兆言打电话跟我说，花篮买到了，是鲜花，问我绸带上怎么写法。这倒是个难题，我想了想说：“就这样写，‘三官呀，你去早了。’具名嘛，就写‘阿哥，阿姐，满姐姐。’你爸爸一死，只有你妈这样唤我们三个了。”

搁下话筒，我回过头来问至美，“这样好吗？”至美噙住了，手掩着脸点了点头，只见泪水从她的指缝里往外溢。

013

还没听念完，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。文章写得这么感人，固然是缘于写实，缘于真情，可怎样才能把真情写出来，同样需要潜心构思，苦心经营。我与至诚先生也有很多交往，至善先生把文章念给我听，让我看到他不耻下问，极其谦恭的一面。

五

至善先生晚年有点悲凉和寂寞。“为了子女宁肯把心操碎的可敬的父亲”圣陶先生走了，“好兄弟”至诚走了，长子三午走了，次子大奎走了，相濡以沫的满子也患了老年痴呆症，无法交流了。他好多次和我谈到，他与父亲圣陶先生相比，最缺少的是没有朋友。茅盾、郑振铎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郭绍虞、顾颉刚、王伯祥、章元善、胡愈之、朱光潜、王了一、赵朴初、徐调孚、周予同、周建人、巴金、萧乾、吕叔湘乃至胡绳、胡乔木等名家都是圣陶先生“一辈子”的朋友，而至善先生的朋友真的不那么多。好在他特别喜欢音乐，西方的，中国的，古典的，流行的，都喜欢听，晚年在看书和写作之余试着吹箫，吹埙，还向我打听

能不能托日本朋友帮他买一把锯琴，后来又尝试着“倚声填词”，前后将一百五十首古诗词填入人们耳熟能详的一百五十首老歌，一九九八年编汇成《古诗词新唱》，出版后引起了同好者的关注，行家们对他在音乐方面的功力和造诣赞叹不止。

《古诗词新唱》最早在《民主》杂志发表时，至善先生拟的一则“赘言”中写道：

中学时代唱过不少我国诗词配上欧美曲调的歌，大多出自弘一法师之手，当然在他出家以前。我很喜欢唱这样的歌，因而记熟了不少古人的诗词，同时记熟了不少欧美的曲调，有各国的民歌，也有名家的传世之作。老来越发好弄，忙里偷闲，哼哼唧唧，居然凑成了若干首。想陆续发表，求正于同好。

“同好”看了又惊又喜，怂恿他多配几曲，至善先生也不负众望。他在后来写的《〈古诗词新唱〉前言》中说：“古代的诗词本来都是可以唱的。先是没有记谱法，没法把曲子记下来，只能口耳相传；后来记谱法是有了，却不很完善，又不能普及，主要仍旧依靠口耳相传。年代隔得久了，曲子渐渐亡佚，诗词失去了音乐的依傍，只能吟诵，没法再唱，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。配上现成的曲子，使某些古诗词能够唱，多少可以弥补一点儿缺憾吧。”“倚声填词”，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。不仅词、曲要按词（曲）牌填词，就是格律诗也要按绝、律的字、句、声、韵写作。此外，诗、词都还有句式、对仗的要求。“倚声填词”因为有内容受形式束缚之弊，因而也对字、词锤炼以及情意浓缩有更高的要求，只有配得“和谐”了，才更有利于吟咏、记忆、唱和、流传。至善先生煞费苦心，他给诗词配的曲子，屡见“奇妙”，唱罢会“绕梁三日”。年过八旬，思维如此活泼，“脑细胞尚能跳迪斯科”，让人有“只此一家”的赞叹。

至善先生听了当然很欣慰。他说如果有人“在唱这些歌的实践中能得到乐趣，从而对诗词和曲子偶有兴会，就是我莫大的幸运了”。这“莫大的幸运”同样得益于他的“认真”。他在《〈古诗词新唱〉前言》中说：

给一首诗或一首词配上现成的曲子，先得选定配哪一支曲